

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

房锐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司马相如学识渊博, 功底扎实, 文才惊人。关于相如之学的来历, 学界存在着文翁派遣相如受经、相如从胡安受经、相如从其父受学等说法。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

关键词:司马相如; 受学说; 文翁; 胡安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8)03-0124-04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辞赋家, 班固称其“多识博物, 有可观采, 蔚为辞宗, 赋颂之首”^{[1]3121}, 林艾轩称其“赋之圣者”^{[2]3300}。刘勰《文心雕龙》卷八《练字》云:“陈思称扬、马之作, 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 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 抑亦字隐。”^{[3]1455}相如文才惊人, 学识渊博, 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

从相如《上林赋》、《难蜀父老》、《封禅书》等传世之作中, 可知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且尊崇儒术。关于相如青少年时代师从的对象, 现存相如文集未记载,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亦未提及, 这为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想像空间。王瑶先生在《读〈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指出:“蜀中文化开明是始于文翁的守蜀, 而司马相如是以学术文章显世的第一人……相如对于蜀中文化, 且有领导推动的事实; 而蜀中文风之盛, 却是在他以后的事情。那么相如自己的教育,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4]390}这一疑问是具有代表性的。相如之学, 究竟从何而来, 围绕这一话题, 学界存在着文翁派遣相如受经、相如从胡安受经、相如从其父受学等说法。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

一 文翁派遣相如受经说

在关于司马相如受学的诸多说法中, 以此说的

影响最大。据目前所知, 这一说法最早见于《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传中记载, 秦宓在致蜀郡太守王商的书信中说:“蜀本无学士, 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 还教吏民, 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 相如为之师。’”^{[5]722}此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司马贞为《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句所作《索隐》称:“按: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6]2287}齐召南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句作《考证》云:“按《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 还教吏民。’然则相如即文翁所拔以为蜀人师者。其语与《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其教, 相如为之师者’正合。但此《传》及《相如传》并无明文。”^{[7]128}

据《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卷五八《梁孝王世家》记载, 司马相如早在景帝时便已离蜀, 并为梁孝王所知。相如之学, 与蜀郡太守文翁化蜀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 而相如本人更不可能被文翁派往长安学习经术。据《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记载, 文翁派遣赴长安求学的是“郡县小吏”张叔等人, 非秦宓所说的司马相如; 张叔等人“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 非仅学儒家经典, 更非秦宓所说的“七经”^{[1]2688, 2689}。可以肯定, 司马相如青少年时代确曾

收稿日期:2007-10-11

作者简介:房锐(1966—), 女, 河南沈丘人, 教授, 文学博士。

接受过经学教育,但这一教育却与蜀郡太守文翁无关^①。

蒙文通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8]27}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早在文翁化蜀之前,巴蜀文化就已经是长江上游较为发达的区域文化。西汉前期,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空前频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儒学在巴蜀地区也有所传播,这为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人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文翁派遣相如受经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司马相如的实际情况的。

二 相如从胡安受经说

此说多见于古代典籍。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三《名胜记第十三上·川南道》云:“按《益都耆旧传》:胡安,临邛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经。”同书卷七四《神仙记第四·川南道》引《方輿胜览》云:“白鹤山,在邛州城西八里。常璩曰: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之白鹤也。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为白鹤台。司马相如从胡安先生授易于此。”^{[9]175,224}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二五《山川·直隶邛州》“白鹤山”条注云:“在州西七里。《华阳国志》: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此北有孤石耸立,高百丈,常有鹤巢其上,因名。汉胡安教授山中,今有点易洞。”同书卷二七《古迹·直隶邛州》“点易洞”条注云:“在白鹤山,汉胡安建讲易学,司马相如从之受经。”同书卷三八之一《隐逸·直隶邛州》“汉胡安”条注云:“临邛人,隐居白鹤山讲学,司马相如从之受经。”^{[10]412,506,204}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一云:“胡安,临邛人,相如从受经。”^{[11]577}

此说对当代学者亦有一定的影响。如金生杨先生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中认为:“史书记载司马相如从临邛胡安受《易》,而胡氏易学渊源不明,但比文翁遣弟子受学似还要早。”“胡安授《易》司马相如,而地点就在临邛,是其易学并非传自博士。胡安易学源于何人,史书未有明确记载,由此看来,蜀中易学在文翁兴学之前就已经有所传播。”^{[12]41,48}

据《蜀中广记》、《四川通志》等记载,司马相如从胡安受经说,见于陈寿《益都耆旧传》、常璩《华阳国志》及祝穆《方輿胜览》中。但《益都耆旧传》早

佚,今本《华阳国志》无此条,《方輿胜览》卷五六《邛州》“白鹤山”条注云:“在城西八里。常璩曰:临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鹤也。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为白鹤台。”同卷所载“四六”云:“胡氏之易,相如之赋,在汉有闻。”^{[13]976,977}书中并未记载司马相如从胡安受经一事。因此,此说可靠与否,值得怀疑。

应该指出,巴蜀易学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程颐有“易学在蜀”^{[14]10440}之叹,刘咸炘有“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15]2100}之语。但在西汉前期以前,巴蜀易学的传承情况不明。而司马相如从胡安受经说,当是后世文人对相如师承关系作出的一种推测,其说法虽然不一定可靠,但并非空穴来风。

三 相如从其父受学说

此说乃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提出,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应劭《风俗通义序》云:“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未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16]2}王瑶先生《读〈史记·司马相如传〉》在引用《风俗通义序》后,指出:“据此可知当秦亡以后,学者们入蜀的也很多,而且连秦的秘室文献也有携入的。而严君平及林间翁孺才等族,也都是这时入蜀,并非祖居蜀中的。”^{[4]393}他在文章中推测道:

以情理来说,相如在景帝初就到京师供职,而且又那样有才力,自然是早年在蜀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以当时蜀中一般文化情形的僻陋说,则他的教育只能受之于家庭。所谓‘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就是指他在家庭学习时的情形说的。可知他的父亲一定是位有优良学识的人,其姓名事迹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入蜀的学者多半是罪犯的关系。由其家中仍保有渊博的学识看来,他们迁蜀的时期不会太早,大概是秦亡后天下大乱时迁入的;据上引《风俗通义》序,知道那时入蜀的学者很多。子婴降汉为公元前207年,汉景帝即位为公元前156年,中约五十年左右。由此推之,当时入蜀的可能就是相如的祖父。入蜀后学者不善于治生产,所以家境仍是贫乏,

到文景天下大定之时,他父亲大概已经年纪大了,遂居家课子,不再求仕了。所以相如虽然生在那样荒僻的地区,还是能够少年知名的。^{[4]394}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司马贞为“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句所作《索隐》云:“孟康云:‘爱而字之也。’”^{[6]2287}《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记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颜师古为“名犬子”句所作注云:“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其为“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句作注云:“蔺相如,六国时赵人也,义而有勇,故追慕之。”^{[1]1923}金国永先生认为:

关于相如的青少年,《史记》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被班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又被历代《史》《汉》注家所误训,原文是:“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文义再明白不过了。犬子是他父亲为他取的名,而不是注家们所说的字或爱称。后来他自己才改名相如。问题出在为什么他父亲因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名之曰犬子”。班固不理解,妄删“故其亲”“之曰”五字,把前后的因果关系删掉了,对正确了解相如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设下了障碍。

现在先解释一下以犬子为名的真正含义。《国语·越语上》:“生男子,二壶酒,一犬。”注:“犬,阳畜,知择人。”可见三国时代的韦昭,都还懂得勾践所以用犬来激励全国男儿,是希望他们成人后都要作个大丈夫,在他的领导下振兴祖国,灭吴雪耻。那么,在西汉初年的相如之亲,见相如努力习文练武,“故名之曰犬子”,以鼓励他日后成长为知择主而事、建功立业的大丈夫不是很自然的么?但是,相如并不满足于作一个一般建功立业的大丈夫,而立志作一个像蔺相如那样以其大智大勇,建立特殊功勋的奇男子,所以“更名相如”,不也是很自然的么?^{[17]2-3}

金国永先生的说法,对于我们了解司马相如早年的家庭教育是有所启发的。相如之父为其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少年相如学文习武,父亲对其寄

予了极高的期望,而父亲的期望当对相如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相如“既学”后,又有了更高的人生目标与追求。蔺相如是战国时代赵国的上卿,以运筹帷幄、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大智大勇著称于世。从相如更名之举,可看出他渴望像蔺相如那样建功立业、青史垂名的志向。蔺相如位列上卿,居众卿之长,而相如字长卿,两者之间或许亦有联系。另,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亦字长卿,这种“巧合”恐非偶然^②。可以推测,相如以“长卿”为字,当亦有仰慕“兵圣”孙武的因素在内。由此还可作进一步的推测:早在青少年时代,相如便对蔺相如、孙武充满仰慕之情,渴望成为一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出将入相的英才。其名“相如”与其字“长卿”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关联,这与相如的宏伟抱负是相吻合的^{[18]102-103}。相如的抱负已超出了父亲的期望,其给家族带来的欣喜与期望是可以想见的。

应该说,相如之父的见识是超出常人的,他竭尽所能,为相如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相如的成长,是与其早年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至于相如之父是否如王瑶先生所称“一定是位有优良学识的人”、“居家课子”,由于文献阙如,今已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司马相如的故里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地的结论^③。这一结论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探讨相如的故里问题,对于认识相如早年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及其成长经历等当不无裨益。

应该指出,巴蜀各地文化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是古蜀文化的中心,从秦国征服巴、蜀古国,到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成都不仅是蜀郡统辖的核心区域,还是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记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颜师古注云:“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1]2689}据此,文翁在成都兴办学校,招收对象为郊区子弟。他试图通过教学,把这些学生培养成基层官吏,从而达到在全郡范围内施行教化的目的。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化蜀,影响深远,“巴、汉亦立文学”,“巴、汉亦化之”^{[19]141,534}。可以推测,在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成

都地区的文化水准、学术水平,是远远高于巴蜀其他地区的。相如之父从安汉县移家至成都,当是有所考虑的。相如在青少年时代一定接受了严格而又系统的教育(包括经学教育),其师从的对象当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

综上,司马相如渊博的学识、扎实的功底、惊人

的文才,与文翁派遣受经无关。相如从胡安受经及从其父受学等说法尽管不一定成立,但相如早年在蜀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毫无疑问的。而相如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为一代“辞宗”、“赋圣”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由于文献失载,我们或许无法解开相如的师承之谜,但关于其师承关系的探讨,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注释:

- ①由于受秦宓之说的影响,关于司马相如在文翁石室传经的说法亦流行于世。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益州》“孔子庙”条云:“昔司马相如教授于此。”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名胜记第一·川西道》云:“《寰宇记》云: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按秦宓引《地里志》: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土,盛于其世矣。”秦宓提及的《地里志》,即《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原文如下:“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段从两个方面说明文翁与司马相如在改造蜀地固有文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相如实际地位及其贡献的深刻体认,班固称之为“师”。秦宓所谓相如“还教吏民”的说法显然与班固的本意不相符合,因此,其说是不能成立的。参见房锐《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唐都学刊》,2007年第6期。
- ②在2004年10月召开的“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上,毕庶春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曾提及此。
- ③参见:李大明《关于“司马相如故里”的探讨》(《光明日报》文化周刊,2004年12月31日,题目改成《司马相如生于蓬安》);房锐、邓郁章《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龙显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三题》(邓郁章、赵正铭主编《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詹鍈.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班固.前汉书[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8]蒙文通.治学杂语[M]//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
- [9]曹学佺.蜀中广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0]黄廷桂,等.四川通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1]姜宸英.湛园札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2]金生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 [13]祝穆.方輿胜览[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5]刘咸炘.推十书[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96.
- [16]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 [17]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8]房锐.关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司马相如《自叙》关系之探讨[J].中华文化论坛,2007,(3).
- [1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